

学习马克思关于过剩人口 增长规律的论述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程 度 王 冰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学习马克思关于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的论述,对于认识当今中国及世界人口的超速膨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不同社会形态下存在过剩人口,并对其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规律作过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①这一段话明确告诉我们,过剩人口并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中、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我国学术理论界过去对马克思论述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宣传和研究是较多的,但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一般形态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对我国的人口理论和实践带来沉重的损失。

一

马克思把不同生产方式下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和人口增长规律联系起来阐述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因为过剩人口的出现与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密切相关。人口增长规律是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则是人口增长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人口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按什么样的规律增长?这个问题从人口生产本身是无法论证的,只有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马克思早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在人类社会,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他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要,以及人口的生产并列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并且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作用。”^②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种生产既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那么它们之间在运动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互相适应和互相矛盾的问题,过剩人口就是在两种生产的矛盾发展中产生的。概括地说,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增长必然会受到物质生产制约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必然会导致人口过剩。马克思说:“社会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③“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

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④

马克思在上述后一段话中，提出了三个概念的人口，即正常人口、过剩人口和可能产生的人口。我们认为，正常人口应当是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人口，过剩人口是超过物质生产需要的人口，可能产生的人口是指社会生产除了供养正常人口之外，还可能供养一定限度的过剩人口。正常人口与可能产生的人口，反映了两种生产互相适应和互相矛盾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适应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因此，在两种生产互相矛盾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实际人口就有可能超过或低于正常人口，过剩人口就是实际人口超过正常人口以外的人口。在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下，过剩人口的出现，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马克思指出的可能产生的人口中，包括了正常人口和过剩人口。这是因为一定限度的过剩人口既为既定的生产限度所允许，又为生产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劳动力条件，所以马克思才说：“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是被决定了的。”

但是，一个社会也不能供养无限度增长的过剩人口，“人口究竟能超过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正象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一样。”⑤如果人口不顾这个限度而盲目增长，则会使两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并将为该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引起社会的紊乱。马克思引用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国家为例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⑥

不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是由当时的生产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讲到生产条件时，除了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条件外，还包括了人口本身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条件同样地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⑦可见，马克思在使用生产条件的含义时，比社会条件或生产基础的内容要广泛一些。因此，可以说过剩人口的产生受三个因素的决定：一是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生产关系的性质，三是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判断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上是否存在过剩人口，应从这三个因素的联系中去考察，不能只从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我国人口学界过去曾有一种偏向，就是只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衡量过剩人口出现的可能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会存在过剩人口，永远不会产生就业问题，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马克思认为不同社会形态，在一定生产基础上，都有可能产生过剩人口，但是过剩人口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形态和生产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随生产条件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某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产生的过剩人口，到了另一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的另一阶段上，则有可能成为必要人口。必要人口和过剩人口，可以随新的生产条件的出现而互相转化。马克思说：“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⑧“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却不是这样。”⑨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十分荒谬和幼稚地把不同社会形态可能产生的过剩人口，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毫无差别的、与社会无关的自然规律，因而他就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为什么一切社会形态，都会出现过剩人口这一事实。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就在于“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

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⑩

过剩人口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它自身产生、发展和消失的条件，过剩人口规律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上不产生过剩人口，或者在产生后限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只有从改变过剩人口产生的社会生产条件着手，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对比关系中，去求得两种生产互相适应。

二

马克思在研究前人关于过剩人口的论述之后，给过剩人口的范畴作了科学的概括。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中，有不少人都把人口过剩定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对比的过剩。马尔萨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剽窃了笛福、斯图亚特、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命题，^⑪也把人口过剩归结为“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两者之间的对比”^⑫的过剩。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的，^⑬并且，他以牧师的狂热特别强调和宣扬了这个理论。

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绝不是象过去的经济学家和马尔萨斯等人所宣扬的那样，是相对于现存的生活资料的绝对量的过剩，而是相对于一定生产条件所规定的界限的过剩。生产条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生产条件改善了，那么由旧的生产条件所规定的界限消失了，旧的过剩人口也就不存在了，新的生产条件又会为人口增长规定新的界限。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这个界限，又会产生新的过剩人口。因为在当时的所有制的物质基础上，既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量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从而在当时的同一领域同一空间下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人口的增长只能与一定领域一定空间下的生产条件所规定的限度相适应，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产生过剩人口。所以，马克思说：“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⑭又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它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⑮从马克思的后一段话中很明显地看出，过剩人口在古老的原始社会的狩猎经济时期就已出现。它的出现并不是当时人们占有的土地资源已不足以养活狩猎民族的人口，而是当时的各部落所占有的狩猎地域上所猎获的生存资料满足不了各部落成员的生活需要。为扩大以狩猎地域形式存在的生产条件而引起的部落之间的争斗或战争，只不过是过剩人口存在的一种现象形态。

马尔萨斯在过剩人口范畴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撇开了人口运动的历史现象。把人口相对于生产条件的过剩变为人口相对于食物量的绝对过剩；把具体的、历史的人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的人；把过剩人口的历史规律看成是与历史规律无关的自然规律，“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成了马

马尔萨斯式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⑩

以上是从事总体上，从全社会的两种生产条件的对比上来阐明过剩人口的范畴的。就个人而言，或者就活的个体而言，他是否成为过剩人口的关键在于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能否与物质生产条件发生联系，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这种联系。马克思说：“‘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剩余来自劳动能力。”^⑪也就是说，过剩人口是具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客观的生产条件去实现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人口，他不能通过劳动去生产并获得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命所必须的生存资料。因此，对于一个劳动人口来说，首要的条件是要能与生产条件发生密切联系，要能参加生产，并与一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他成为一个生产者。如果他得不到这个条件，或者得而复失，那么他具备的劳动能力，就不能转化为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命的必要的生存资料，他就只能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或者说是过剩人口。所以马克思说：“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指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引者）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能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对生产条件的这种〔传统〕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为自己谋取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⑫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他能不能与物质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关键，并不在于劳动者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当时的社会制度，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取决于“当时的所有制的物质基础。”^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一个劳动者与社会生产条件联系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各部落的成员是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当生产条件不足以养活全体成员时，就会有“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争夺生产地域——引者）中出现的过剩人口，”^⑭或者以“遣送出去的移民”^⑮形式出现的过剩人口。在奴隶社会，作为劳动人口的奴隶，是奴隶主直接占有的与牛马一样的生产工具，因此奴隶是不存在过剩人口的，但是也有过非劳动者的过剩人口。马克思说：“我们从未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隶。相反，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非劳动者（就直接〔参加生产〕的意义上说）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他们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⑯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劳动人口的工人要通过“社会媒介”^⑰才能与资本家占有的生产条件相结合，工人的劳动能力能否实现，能否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完全取决于资本的需要。如果他在市场上不被雇佣，或者在雇佣后被资本家从生产中游离出来，他们就变成了过剩人口，就变成了赤贫。“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⑱因而，“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出现，是资本时代的现象。”^⑲

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与社会生产条件发生联系的方式不同，因而各个社会出现的过剩人口的性质也不同。过剩人口的产生是由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关系，特别是人口与生产力水平的对比关系决定的，而过剩人口产生出来之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则由当时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说：“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⑳“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造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㉑马克思在这里不仅阐明了不同社会

制度下的过剩人口的性质不一样，并且也论述了同一社会制度下过剩人口的性质也不一样，同时，他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指出，那种专门以消费他人产品为业的游手好闲的人，不仅不是“被人口论的狂热信徒看作是必要人口”，^{②⑧}而且也不能算作“不劳动的过剩人口”，因为“经济学家谈到过剩人口时，指的不是这种游手好闲的过剩人口。……‘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②⑨}

马克思在论述过剩人口时还指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存在过剩人口的标志，只能是人口与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的对比关系，而不是过剩人口的数量多少和规模的大小。否则，就会混淆正常人口与过剩人口的界限。所以马克思说：“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③①}

三

马克思在探导各种社会存在的过剩人口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之后，将历史上的过剩人口现象归结为两种类型的过剩，即人口压迫生产产生的过剩与生产力压迫人口产生的过剩。所谓人口压迫生产，是指人口增长过快，而生产力发展不足，物质生产增长缓慢，人口的增加要求生产迅速发展，但它产生的压力又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从古代移民发生的原因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世界各国。”^{③②}所谓生产力压迫人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以后，机器操作代替了手工劳动，机器排挤工人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所以马克思说：“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③③}

人口压迫生产力，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因为它们“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③④}生产的方式没有什么革新，劳动的方式也没有多大变化，致使物质产品不能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某一民族或国家在既定的地域内，只能养活一定限度的人口，超过了这个界限就会产生过剩人口。所以，马克思指出：“古代国家……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③⑤}并对亚洲高原更原始一些的野蛮人游牧部落只能养活一定限度的人口情况，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些部落“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③⑥}

生产力压迫人口，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时期，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方式的幼年时期也不能出现。”^{③⑦}很明显，生产力压迫人口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新现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工业的产物。现代化大工业以在生产中运用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生产工具为标志，而它们在生产中的运用必然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从而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专章论述和分析。他说：“我们在这一章（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引者）要研究资本的增殖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③⑧}马克思的分析得出，当资本构成的变化速度大于资本积累的增进速度时，工人就会不断遭受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威胁。由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越来越多，而劳动力的量相对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则越来越少，反映在价值构成上，则是不变资本部分的比重日益增大，可变资本部分的比重相对减少，从而生产所能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对减少，使大批

劳动力不断地从生产中被游离出来。因此，“资本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人口。”^{③⑨}而“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④⑩}所以，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或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或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④⑪}

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移民现象，进行过详尽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发现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产生的规律。他还指出，移民现象不仅是人口过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解决人口过剩的重要途径。他说：“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④⑫}在原始社会“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他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这些部落的人口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充满危险的大迁徙。”^{④⑬}

处于奴隶社会的国家，在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生产所规定的限度，产生人口压迫生产力以后，强迫移民也是解决过剩人口的最重要的途径。“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④⑭}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移民现象，与古代移民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现代移民是生产力压迫人口所引起的。马克思说：“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完全不同。”^{④⑮}“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所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耕作方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④⑯}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飞速发展的生产力要求减少人口，要“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④⑰}在这种生产力压迫人口规律的作用下，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发生了一场震撼着社会生活的强迫移民运动，成百万的居民被迫离乡背井，脱离祖国、投奔大洋彼岸。“不仅一贫如洗的绿色艾林（即爱尔兰的古称——编者）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由于农业的改良和‘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而被赶走，也不仅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平原的强壮的农业工人被赶走（他们的迁移费是由移民局代办发给的），而且另一个阶级——英格兰最稳定的阶级，现在也被卷入这个‘改良’过程。在英格兰的小农场主中间，特别是在那些租赁粘性重的土地的小农场主中间也发生了惊人的移民运动。”^{④⑱}

由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人口社会移动，作为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正象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象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④⑲}

四

马克思的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理论，是普遍地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当然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对我们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人口与生产力水平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以便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提供有益的经验。

马克思曾经对我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过研究，并对当时尚处于清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作出过存在过剩人口的结论。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④⑳}“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

重枷锁。”^⑤当他在1850年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正是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口增长特大高峰年代，那时（公元1851年，即清朝咸丰元年）人口已膨胀到4.3亿，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1.2亿的38%。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也曾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旧中国存在过剩人口，乃是无容否认的事实。

马克思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论述，已经过去一百三十多年了，我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天，过剩人口增长规律仍在中国发生作用，我们目前仍然存在过剩人口，因为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还未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完全改变。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虽然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现代化的速度并不快，农业现代化刚刚起步，从而造成工农业吸收新增加的劳动力和供应全国人口生存资料的能力尚低；从人口生产本身看，过去三十年人口盲目增长的结果，不但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今后还将产生更加沉重的压力；从生产关系看，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形式）”不再“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⑥相反，它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媒介”作用，促使全社会的劳动人口“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资料。”^⑦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本质上来讲，能使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消失，并能调节人口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比关系，使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互相适应。但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它在调节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关系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两者之间的比例失调局面并没有得到纠正，以致过剩人口仍然存在。

我国目前存在的过剩人口与以前各社会形态的过剩人口，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以前的过剩人口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是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结果，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国目前存在的过剩人口，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消灭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人都能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目前的过剩人口是人口与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工作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控制人口增长的胜利，它将逐步消失。

我国目前存在的过剩人口的表现形式，也与历史上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历史上的过剩人口，主要表现在移民、失业、饥饿和战争上，而我国的过剩人口，则表现在新增加劳动力的待业、在业劳动力的利用、粮食等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所以，党的十二大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⑧

注释：

①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4页。

③④⑤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⑩⑪⑫ 同上书，第106页。

⑬ 同上书，第107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672、691、692页。

⑫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28页。

⑭ 同上书，第1卷，第619页。

⑮ 同上书，第12卷，第587页。

⑯ 同上书，第7卷，第264页。

⑰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